



博士论丛

# 变迁中的心态

——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

王跃著

CHANGES OF THE MIND  
——THE CHANGE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变迁中的心态

——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

王跃著

CHANGES OF THE MIND  
— THE CHANGE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MAY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 / 王跃著.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3

I. 变... II. 王... III. 社会心理—研究—中国—1919  
~1924 IV. K26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454 号

## 变迁中的心态

——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

王跃 著

责任编辑：刘新民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32开 印张：6 字数：1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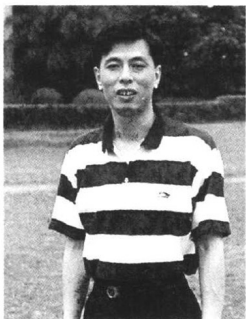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55-3163-6/G·3158

定价：13.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作者简介

王跃，1959年1月生于安徽合肥。1982年2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学者张静如教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9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著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之社会变迁》、《中华国魂》（第四册）、《毛泽东研究全书——著作卷》、《中国现代化史（上）》（参著）等；主要译著有：《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等；主要论文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意识变迁》、《党史、革命史研究应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五四运动新议——从民众心理史角度考察五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系》等。现于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政治系任教。

## 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革命史研究（代序）

张静如

我的博士生王跃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即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想让我给他写篇序。我的博士生出书，不管多忙，都要给他们写个序，因为在我这里，学生的事历来是摆在第一位的。我认为，培养、扶持、鼓励青年人，是我的责任。王跃这本书，当然也不例外。

看到王跃的书稿，使我想起 15 年前的事情。王跃是 1985 年 9 月入学读硕士学位的，那时我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从社会史入手深化党史研究的问题了。从 1982 年到 1985 年，我在外地高校作学术报告时多次讲到研究党史必须研究社会，并以研究北洋军阀时期中国社会为例。1986 年第 6 期《教学与研究》发表的我和刘志强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和革命》，就反映了我当时研究党史的思路。正是这个时候，我组织北京几所有党史硕士点的高校的研究生进行论文讲演比赛。于是，我让王跃从社会意识变迁的角度写一篇文章。他是一个聪明人，很快就领会了我的想法，写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意识变迁的趋势》参加比赛。这篇文章被丁守和看上了，发在《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上。就在这个基础上，王跃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而我在指导他写作的过程中，也不断丰富自己，逐步形成“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构想。1991 年《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的这种构想。我的构想发表后，虽然也有人不以为然，但多数青年学者是赞同

的，而且陆续结出了果实。郭学旺的《毛泽东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运动史》等专著，都属于这一类。王跃的专著，自然也是属于此类，而且我认为它比较好地体现了我的构想。

说实在的，我的本意是为党史研究找出路。80年代初，我看到中共党史学在新形势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十分高兴，但同时已经感觉到不久就会走入死胡同，应及早考虑如何深入发展的问题。所以，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的构想，确实是从实用目的出发的。没有想到为了论证这一构想，不能不涉及对社会史的看法，而成为对社会史理解的一种观点的代表者。其实，对社会史的不同理解，不始于我们这一代，在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史学界就有两种不同看法和做法。分歧的主要点，在于对研究对象的“社会”和“人群”各有不同的说法，也各有不同的道理，于是做法也就不同。对此，我不想多说，因为第一，我在自己的文章里已经说清楚我的想法；第二，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的存在并没有坏处，所做出来的成果，对学术发展都有贡献。比如，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对社会史的理解与我不一样，但这一成果的近现代部分对党史的研究就很有用处。这里，还是想对党史研究的深化问题说几句话。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研究整个中国社会不行，因为党史研究的对象就是处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进化与变革之中。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步也离不开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全部都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这样，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进化和变革，都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反之，后者又会对前者发生大小不等的影响。由于两者的互动关系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动的目的在于对全社会进行改造，所以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而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就不能只研究社会的一部分，而要研究社会的全部。很明显，如果按照

“社会史是社会生活史”的办法，只研究不包括经济、政治的“社会生活”，那在党史研究中就难于真正达到深化的目的了。

总之，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革命史研究，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主要是实践问题。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是找材料难，二是分析难，三是出版难。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希望有更多的出版社能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问世。湖南教育出版社能对出版这方面的成果予以重视，无疑是一件值得学术界称道的大好事。

话说回来，王跃的这本书是研究五四时期的社会心理的，难度很大，因为反映社会心理的材料实在难找。对此，王跃克服困难，在书中用了大量可信的材料，有力地说明问题。同时，书中的分析也很细致，有一定深度。这一成果，对研究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历史十分有用。当然，书的质量如何，总要通过读者去评判，研究者在读后会有结论，不用我再多说。

1999年11月 于北京

## 目 录

<b>第一章 方法及领域</b> .....	( 1 )
一 社会心理变迁：观照历史的新视野 .....	( 1 )
二 社会心理结构及其历史载体 .....	( 6 )
三 时代精神：“现代化”与“革命” .....	(10)
<b>第二章 “精英”们在想什么？</b> .....	(15)
一 一面易被忽视的镜子：统治观 .....	(16)
二 时代浪尖“宠儿”的观念演进 .....	(20)
<b>第三章 走出迷惘的“历史主体”</b> .....	(27)
一 从清末民初到护国：迷惘的“主体”开始觉醒 .....	(28)
二 政治自主意识之一：从合作、依附到历史性游离 .....	(33)
三 政治自主意识之二：参政和干政 .....	(39)
<b>第四章 芸芸众生之政治心态</b> .....	(44)
一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了吗？ .....	(45)
二 五四运动：民众政治心理的历史性转折 .....	(54)
三 三个民意测验反映的民众政治心理 .....	(62)
四 “直接民权”和“国民革命” .....	(68)
<b>第五章 “人伦”的新意义</b> .....	(74)
一 女权运动的历史境遇 .....	(74)
二 坍塌中的“人伦”重镇：五四后的婚姻家庭道德观 .....	(83)
<b>第六章 变化中的“彼岸世界”</b> .....	(99)



---

一	传统宗教心理的衰变·····	(100)
二	基督教的长足发展·····	(108)
三	新的本土宗教·····	(113)
<b>第七章</b>	<b>日常生活心态的新取向</b>	
	——社会习俗变迁之一·····	(116)
一	“番菜”的“风行一时”·····	(118)
二	不仅仅是趋“洋”的服饰心态·····	(123)
三	“行”、“住”观的新追求·····	(136)
<b>第八章</b>	<b>刚跨出中世纪门槛的礼俗和时俗</b>	
	——社会习俗变迁之二·····	(145)
一	人生礼俗变异之历史意蕴·····	(145)
二	岁时节令习俗的式微与替代·····	(158)
<b>第九章</b>	<b>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之启示</b> ·····	(166)
一	社会心理和社会革命·····	(166)
二	现代化：历史还是未来·····	(171)
<b>附录</b>	·····	(176)
<b>后记</b>	·····	(184)

## 第一章 方法及领域

### 一 社会心理变迁：观照历史的新视野

1929年1月，在法国东北的名胜小城斯特拉斯堡，有两位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共同创办了一份刊物《经济社会史年鉴》。他俩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告读者”：

“我们都是历史学家，都有共同的体验，并得出共同的结论，我们都为长期的从传统分裂状态中产生的弊病而苦恼。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材料时，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正在日渐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者，互不理解，互不通气。现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大声疾呼，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的。”<sup>①</sup>

不久，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在法国爆发。但是，费弗尔和布洛赫所倡导的一种崭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并没有被经济危机所湮没。相

---

<sup>①</sup> 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六期，第65页。

反，经济危机更促使一些历史学家来关心经济和社会问题。于是，出乎这两位历史学家的意料之外，一批志同道合的历史学家逐步团结在这份刊物周围，形成对当今史学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学派——年鉴学派。50年代以来，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在知识界“夺得了几乎一统天下的地位”。<sup>①</sup>

年鉴学派的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历史提出了全新的“理解”。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界形成的史学传统是以德国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实证主义历史学强调在考证基础上，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来阐述历史。因此，传统的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重大政治事件和在这些政治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英雄人物。这种历史学虽然也宣称以人为研究对象，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在这种历史学中是不存在的。占人口多数的普通人最多只是这些“英雄”人物历史画面中模糊晦暗的底色。

年鉴学派一反传统的史学思维方式。他们主张历史学研究，“就是要坚决地脱出历史事件、纯政治因素和历史人物的框框，以便更好抓住真实历史的动力，即成千上万的基层人物和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这两个‘成千上万’把那些在时代广告橱窗中充当摆设的人像抛在一边，自己创造着真实的历史”<sup>②</sup>。

把史学研究的眼光转向普通人，并不需要像传统史学那样，去注意英雄人物的行为，考证他（她）的生活经历，深究其个人的心理活动。……那些没有惊天动地英雄业绩、平凡的普通人，他们一生的经历有时还不如一个伟人一天的活动。但是，当普通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日常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受其制约又反过来影响它的普通人的心理、情感、信仰、价值标

<sup>①</sup> 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六期，第65页。

<sup>②</sup> E. L. 拉杜里：“新史学的斗士们”，转引自《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

准等等，则是比传统少数英雄人物业绩更富有“历史意义”的历史。而这些问题，仅仅靠对少数人的考证、重大历史事件的堆砌、罗列是无法回答的。它需要引进新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和阐述。这就把历史学家召唤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中。在这个新的领域中，成千上万普通人、各种各样自然的、地理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宗教的等等现象都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在理论体系上的完善，操作手段上的进步，又为历史学借鉴其理论和方法，形成一门综合性的新学科创造了条件。

除了研究方法上的差别外，新的研究对象还决定了对历史上时间概念的不同理解，“变迁”成为观照历史发展的一种新视野。因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那些急剧变化的、表面上轰轰烈烈的事件，如战争、冲突、政变等，而是那些大时空跨度的历史现象。这些历史现象涉及面广，延续时间长，具有变迁缓慢的特点。它不能以某天上午或下午、某几天或几十天来展示其变化。一般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能显现出这类现象的“历史”意义。

不难看出，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许多方面是不谋而合的。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勒巴克拉夫从五个方面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历史学家思想的影响：

“首先，它（指马克思主义——作者注）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

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史学的兴趣。”<sup>①</sup>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的贡献主要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上，那么，年鉴学派等新史学流派则更多地致力于实际的史学研究活动和艰辛的实践。在他们看来，在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时，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心理活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年鉴学派也正是因为因为在经济社会史、社会心态史两个领域中的卓越研究成果而奠定其学术地位的。

经济社会史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史，它不是一大堆经济统计资料的组合，而是从人们具体的、活生生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出发来揭示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社会心态史也不是去探讨过去人们的心理机制，更不是为了说明少数英雄人物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对社会心理、民俗民风、宗教信仰、流行观念等的研究来展示过去时代精神生活的风貌及其演变。

本书所论及的就是五四时期的社会心理变迁。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19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探究这一百多年的社会心理变迁并找到其变迁的轨迹，成为我国史学界目前少有涉及但极有意义的新领域。尽管和社会结构中的其他部分相比较，社会心理有稳定性的特点，其变迁无疑是极其缓慢和渐进的。但是，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社会整体变迁的幅度时大时小，也

---

<sup>①</sup>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27页。

使社会心理的变迁表现出相对的时快时慢。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能明显地感到其变迁的脉搏，五四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心理变迁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前人研究硕果累累。其中集大成者是彭明先生的《五四运动史》。但前人的五四历史研究，要么是以讨论“五四事件”为中心；要么是以研究“五四事件”到“六三”上海三罢期间的政治运动为中心；或者是把研究注意力集中在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面。这些研究虽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生动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以及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但仍未能告诉我们五四时期社会变迁在众多普通人心态上的表现，也未能从社会心态变迁的角度去揭示这些政治和文化运动所蕴含的意义。

由于前人对五四时期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事件、文化运动及其代表人物方面，人们对“五四时期”的理解也往往等同于“五四事件”、“五四政治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其实，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五四时期”是借用了该时期有典型意义的社会政治事件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本书使用这个时间概念的上下限较传统的以事件为中心的概念要宽泛得多。本书的“五四时期”是辛亥革命后到国民革命这段历史时期，与政治上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体吻合。本书之所以没有使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提法，除了因为该时期政治上不仅仅有个北洋军阀政府，还有南京临时政府、广州南方政府等；还因为在该历史时期内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人们社会心理的政治心理、道德心理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五四时期”已不再仅仅是个抽象的时间概念，而是具有体现该时期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特点的一个富有意义的提法。

从社会心理变迁的角度来说，“五四时期”代表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过程中的一次历史性跳跃，它是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在人们心态上的映照。为了研究和比较的需要，本书

某些内容的时间参照系要上溯到清末，下延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

## 二 社会心理结构及其历史载体

何谓社会心理？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界，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是同义词。它强调的是个人在群体中的行为及其心理机制。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心理学是“试图理解和解释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是如何受现象的、想像的或潜在的他人的影响”<sup>①</sup>。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心理只有放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考察才能理解。普列汉诺夫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此作了开拓性的理论阐发。1907 年，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中，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项因素”论：“（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sup>②</sup>

如果把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项因素”论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结构的著名原理相比较，就会发现：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论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典表述之具体而形象的阐述；其中，最富于创造性的，是关于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这种抽象的理论概括，难免使人容易产生“机械论”的感觉，但仍不失为理解社会心理及其结构、特征、变迁等问题的正确思路。

从普列汉诺夫的论述中可以明确：一、社会心理属于被生产

<sup>①</sup> 转引自林秉贤《社会心理学》，群众出版社，1985 年，第 10 页。

<sup>②</sup>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 195 页。

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意识，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二、社会意识有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两种基本形式，社会心理不但是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较直接的反映形式，而且是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存在的中介环节。因此，所谓“社会心理”意指：某个特定范围的历史与社会共同体，在一定社会生活条件直接作用下，自发产生而未经理论加工的非系统化的日常意识的总和。“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特定的民族、阶级或其他社会共同体中普遍流行的、共同的、典型的精神状态。它表现为人们的要求、愿望、情感、情绪、习惯、风尚、情趣等。

从以上的说明中，可以概括出“社会心理”的如下特点：

第一，直观性和非系统性。

第二，客观性。社会心理所反映的社会存在，虽与前人的经验积累有关，但更多的是现世的客观生活条件的反映。

第三，典型性。社会心理是该社会共同体特有的共同心理，它是由共同的存在条件引起的、典型的心理。这种典型的心理并非指全体共同体成员都具有同样的心理，也并非是每个个体心理之和。它是指该社会共同体内具有代表性的心理趋向和价值观。

第四，区域性和民族性。社会心理反映社会存在，无不受到一定范围之客观生活条件的限制。

第五，相对独立性。任何社会意识都有相对独立性，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基本形式之一，也不例外。

第六，网络性。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决定了各种非系统观念的总和（观念群）才能构成反映某一社会生活条件的社会心理，因而社会心理各要素之间势必形成一种网状的横向联系。

第七，历史性。社会心理随着客观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迁。

为了便于更具体的分析，不妨把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视为个体的潜意识和显意识。显意识是经过大脑自觉加工和深思熟虑的观念的总和；而潜意识则是在一定条件客观环境刺激下，人



的一种本能的、直觉的反映。其实个体的潜意识仍是有规律可循的。其主要组成因素是每个人的气质（性格、爱好、习惯等）和情绪（需要、利益、愿望等），以及潜在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这样，可以把社会心理的结构分为三大组成部分：1. 该社会共同体的心理气质，它包括社会性格、风俗、习惯、传统、爱好等；2. 该社会共同体的社会情绪，它包括社会需要、利益、情感等；3. 该社会共同体特有的心理层次的思维方式。社会气质和社会情绪相比较，前者相对稳定，后者则起伏较大。思维方式则是更稳定的社会心理因素，它主要决定于心理积淀（指社会气质和社会情绪的结合体）的结构、表现形式和过程。

关于社会心理的变迁，现代心理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不仅社会心理的内容（即社会心理的积淀物）具有历史性，而且社会思维方式也具有历史性。这些都是心态史学研究的对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心理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心理内容（社会气质、社会情绪）的变迁上。而社会心理层次的社会思维方式尽管也有变化，但变化的幅度较小，难于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找到其变迁的轨迹。所以本书主要考察的是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内容的变迁。

历史科学的特点之一，是其可实证性。社会心理的内容也必须转换成可操作的社会历史事实，才能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社会气质、社会情绪必须有其历史载体。对此，史学界至今仍无较合理、成熟的体系。一般都是以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为基本框架，结合社会心理的特点，来反推社会心理的历史载体。本书采用的方法是以社会上大多数人（尤其是社会中下层）所普遍遵从的、非理论形态的政治、道德、宗教、习俗等方面的日常观念，来作为探究社会心理内容的具体对象。

如果说社会政治观念、社会道德观念、社会戏娱观念等更多反映的是社会心理的情绪方面，那么，社会宗教观念、社会习俗等则更多反映的是社会心理的气质方面。由于社会需要、社会利